

印尼大選與政局的瞻望

羅石圃

印尼已定于今年五月舉行大選。鑒於一九七一年大選的平靜無波、執政黨的「從業集團」取得壓倒性的勝利、以及蘇哈托總統順利當選連任，一般認為此次大選必能順利完成；但印尼新聞部長馬蘇里在政府未決定大選日期之前，曾提出警告稱：如果一九七七年不舉行大選，將有發生政變的可能。可見此次大選乃有強烈的政治暗潮存在。

一 民主主義為建國五原則之一

印尼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宣佈獨立，即以「五大柱石」為立國精神——亦稱「建國五原則」：（一）信奉全能上帝；（二）人道主義；（三）民族主義；（四）民主主義；（五）社會公平、其政制與我國頗為相同。依照一九四五年印尼憲法，全國最高權力機關，為「人民協商會議」，代表人民行使政權，修訂憲法、釐訂國家大政方針、選舉總統、副總統，至少五年開會一次，頗似我國國民代表大會。「人協」代表，包括立法院全體委員，及由全國各地區、各行業所推選之代表所組成，五年改選一次。其行使治權的機構有四：（一）總統，除為國家元首而外，並為行政首長，相當於我國總統兼行政院長。在元首身份上，總統對「人民協商會議」負責，而站在行政首長立場，又對立法院負責，總統任期五年，連選得連任。（二）為立法院，有立法及通過政府預算權，全院委員均為「人協」代表。（三）為最高法院，負責司法事宜，（四）監察院負責政府度支的監督考核及預算審計。①

當蘇加諾執政期間，自一九五五年以後，至他于一九六五年因「九卅」事件下台為止，從未舉行大選，因為各政黨間政爭激烈，特別是堅決反共的回教黨派與印共積不相容。在艾迪（D.N. Aidit）領導下的印尼共產黨，因與蘇加諾相互利用，已將其組織迅速擴張到農民、學生、勞工及文化等各階層之中，除擁有一百多萬正式黨員外，並有一千二百萬同路人②。在此種情況下，舉行大選，有利于印共和平奪權，終必促成與印共勢不兩立的印尼陸軍發動武裝政變，這便是蘇加諾不敢舉行大選的原因。

至蘇哈托以救平印共得到蘇加諾同意的「九卅」政變，在全體軍人、學生與愛國民眾擁戴下而接掌政權，先成立「臨時人民協商會議」與國會，並繼續奉行建國五原則及一九四五年所頒訂的憲法。一九六八年，由「臨時人協」選舉他為總統，他當即表示：為尊重建國五原則的「民主主義」，及人民對憲政的迫切要求，政府將迅速舉行大選。實際上這時政府便已對大選着手籌備，整整

註① 「訪問印尼報告」，郭湘撰，一九六九、四、十二。

註② 「印尼共黨似在死灰復燃」，卡諾（STANLEY KARNOW）撰，華盛頓郵報，一九七〇、一、廿六及廿七。

經歷了三年的籌備時間，始于一九七一年七月三日，使已經中斷了十七年的大選，再在印尼廣續舉行。^③

二 蘇哈托執政已恢復了中斷的大選

一九七一年的印尼大選，必須突破所有民主國家大選史上從未遭遇過的重重難關。在表面上看：此一新興的羣島國家，由于「九卅」事件所觸發的反共怒潮，使羣衆和學生及軍人，一致對共黨份子與其爪牙展開無情的屠殺，約有五十萬人喪生，另有十二萬共黨嫌犯關入了三百多所集中營，且在很多地方，使他們的家人都爲社會所不齒。^④但這並不表示共黨份子已告肅清，實際上在北平羽翼下的印共流亡組織，正不斷指示其仍然潛伏在國內的黨徒，積極部署乘大選機會與風作浪。由于印共在第一次大戰時便已誕生，經歷過獨立運動與各黨派的長期並肩奮鬥，其後在蘇加諾庇蔭下，更使其三百多萬黨員，分別滲入各黨派及人民團體。例如由它操縱的「印尼總工會」(SOBSI)，會員便多達八百餘萬人，潛伏隱蔽，令人無法清查，尤其奉行「蘇加諾主義」各黨，其思想路線，更與共黨混淆得難以劃分。^⑤

當時印尼爲了防範共黨份子及其同路人破壞大選，一方面在「普選法」中特別規定：印共及其從屬羣衆組織成員和「九卅」事變有關份子，都被剝奪選舉與被選權；另一方面又有計劃地派遣退役軍人參加各黨，使他們結合各黨思想正確的黨員成爲主流，以制止走向偏狹極端而受共黨暗中利用，並設法使性質相同的政黨予以合併，到大選提名前，被核定可以參加競選的，共爲九個政黨，依其立場，約可分爲三個類別：(一)極端反共的四大回教政黨：(一)伊斯蘭教士聯合會黨；(二)伊斯蘭聯盟黨；(三)穆斯林黨；(四)貝爾蒂伊蘭黨。(二)左傾的蘇加諾主義三黨：(一)國民黨(民族黨)；(二)貧民黨；(三)獨立維護者聯盟。(三)親政府的自由主義者兩黨：(一)天主教黨；(二)基督教黨。

左傾的三黨，都是蘇加諾當年所創立的，到這位狂人已被國人唾棄鬱鬱而終後，獨有這些政黨的黨徒，仍然對「蘇加諾主義」照舊奉行。他們既堅決主張印尼須走極左的社會主義路線，及企望利用共產黨的助力，且固執地反對外國投資及親西方外交。「國民黨」領導人蘇朋諾(Hadisaeberno)在印尼反共怒潮澎湃時，竟公然指出該黨並不拒絕共黨份子參加^⑥，假如左派在大選中得勢，則蘇哈托政府經過多年艱苦奮鬥所穩定的經濟基礎，及對內反共，對外偏向西方的政策，便都須改弦更張。

左傾的回教政黨，雖然堅決反共，但已走向了偏狹民族主義的極端，對蘇哈托政府所採行的政策，同樣地發生威脅作用。諸如註③「今日印尼」、杜沙(JOHN TUSA)及布勞德沃斯(DENNIS BLOODWORTH)撰，分載于香港「虎報」、一九七一、五、十五及南華早報。六、二、三兩日。

註④ 同註②。

註⑤ 「印尼大選與政局」、本刊、十卷、十一期、一九七一、八、十、拙著。

註⑥ 「印尼普選大勢」、「中央社」雅加達航訊、蘇玉珍撰、一九七一、二、廿二。

他們由反印共、仇北平而發展為怨恨華裔、華僑，經常在反共示威時，不分皂白地搗毀華人商店以至掠奪一空。而他們在反對外資方面，也與左派一致。這種盲目排外的極端民族意識，自亦難免受共黨潛伏份子的利用而走入歧途。一旦經由大選而得勢，便將造成政府吸引外資開發資源的大計中止，又將回復到貧困落後而變為共黨發展的溫床。

印尼現政府所以能在上屆大選獲勝，固然是得力於剝奪共黨及其同路人的選舉及被選權，及大力扭轉左右兩派政黨的偏差，使其極端份子無法抬頭，但別開生面的執政黨——「從業人員集團」的異軍突起，聲勢浩大，加上蘇哈托執政後，將已經破產的印尼經濟局面，扭轉到了安定而趨向繁榮所贏得的廣大民心，更是大選的勝利基礎。

三 上屆大選的致勝因素

基于印尼在爭取到獨立的過程中，貢獻最大的：一是政黨；二是軍人；三是包括公教人員的職工團體。所以一九四五年頒定的憲法，都規定有軍人、職業團體在立法院與「人協」的保障名額。惟以蘇哈托所代表的軍人政府，在大選中既一時無法組成有力的執政黨參加競選，乃由九個職工團體——包括各種工會、公教團體、公務員協會等，聯合組成「從業人員集團」——簡稱「職聯」或「高爾卡」(Serikat Golkar)，用以代替執政黨參加競選。由于這些工會，幾乎都是由軍職外調人員所掌握，其聯合組織的成立，又是出于軍方的大選競選計劃，所以能够先聲奪人。

此一異軍突起的政團，除擁有全印尼的公教人員和職工為其成員而外，並吸收了以華人為主的二百五十萬外裔印尼籍人，且組成了「印尼籍民大家庭協商會」，在中央理事會之下，其分支會遍佈於各省縣(市)，一致從事競選活動，所有參加競選的政府要員，如蘇哈托總統、「人協」議長納蘇申、外長馬力克等，都是由此一政團提名，以致大家紛紛脫離原屬的政黨而加入此一新興政團。這並非完全出于趨炎附勢，也是由于厭棄黨爭，尤其共黨所造成的禍國殃民，及蘇加諾的無視于國貧民困，祇求滿足他個人的狂妄野心。其所以脫黨而加入「職聯」，正是表明擁護蘇哈托的團結安定，力謀經建繁榮的政策。^⑦

印共對上屆大選有無破壞計劃與行動？在「九卅」事變的印尼反共怒潮中，被羣衆掃穴犁庭後的印共，是否仍有殘餘力量，能够死灰復燃？也都是當時值得注意的問題。實際上幾乎在雅加達籌備上屆大選的同時，印共便已建立了中央七人委員會的最高領導組織，在其輔助下，已次第成立雅加達、努山迪加拉、蘇門答臘廖島、楠島等四個地方局。他如三寶壟、斯拉威等的地方局雖未成立，但已有組織型態，活動頻繁。此外在其茉莉芬老巢，設有幹部訓練基地，並經常有來自北平的教官潛入任教。一九七〇年中爪哇的大選資料倉庫被焚，便是印共復活後的傑作之一。^⑧可見雅加達政府對上屆大選所採取的嚴厲防共措施，並非無的放矢。

註⑧ 「共匪在印尼的顛覆活動」、「中央社」雅加達航訊、蘇玉珍撰、一九七一、二、廿。

註⑦ 同註⑥

誠然，上屆大選，有人抨擊為政治權力的濫用，學生領袖且呼籲年輕選民拒絕投票。但其結果，仍然在平靜無波的情況下完成大選，使形同執政黨的「從業集團」，大獲全勝。根本原因，還在于印尼大多數人，了解蘇哈托的救國苦心，力謀將印尼從種族、宗教、思想的分歧複雜衝突中，以及貧困之中拯救出來，正如印尼一位領袖在大選前夕所宣稱：假使「從業集團」不能贏得勝利，全國便會陷入衝突、混亂及貧窮。⑨尤其蘇哈托的經濟政策，已將通貨膨脹，由一九六六年的百分之六百，降到上屆大選前一年的百分之八，這種事實，更會贏得選民的向心。

四 促成大選無法延期的沙維托事件

依照印尼憲法規定，「人協」代表與國會議員任期均為五年，政府須于每屆民意代表任滿前舉辦大選。自一九七一年恢復了中斷已屆十七年的大選後，至一九七六年，便應舉行大選，其所以延長一年，定于一九七七年五月舉辦，顯然是有不得已的原因。上年九月五日，印尼國家電台引述新聞部長馬蘇里在與蘇哈托總統晤談後所發表的談話稱：如果印尼明年不舉行大選，將有發生政變的可能。⑩到九月下旬，一項迫使蘇哈托總統下台的暗潮便已揭開。

九月廿二日，印尼政府發表一份長篇聲明，指出「有人企圖違背憲法的途徑撤換蘇哈托總統」，並逮捕了以沙維托為首的陰謀者。西方通訊社的報導，認為此乃一次未遂的政變，至十月一日，印尼最高檢察官阿里·沙益對記者稱：政府尚在追查沙維托事件的底蘊，由于「從審訊的結果得知，此一事件，並非如表面上所顯示的那樣簡單，目前正在追查幕後的指使人」。蘇哈托政府公開聲明有人圖謀不軌，準備將他的政權推翻，這是他執政十年以來的首次，究竟此一未遂政變陰謀的內情如何？從新聞報導中，我們已有了如下的瞭解：

雅加達政府透露所搜獲的五項文件，可說是沙維托等人的「行動綱領」。其中最重要的，是標題為「走向安全之路」的那份長文。據印尼總統助理——總統府新聞發佈官的國務祕書蘇達摩諾說：蘇哈托讀了這份文件，「感到無比痛心」，並表示此文對印尼局勢的估價，可謂「冷酷無情」。據宣佈：這份被列為第一號文件的主要內容，在認定目前印尼的建設，「也已使人的崇高品德喪失，把人帶向毀滅的深淵，其嚴重性，已達到危害國家生存與民族特性的邊緣，乃至威脅到民族統一與團結和建設的成功」。因此號召大家「盡自己所能，用各種方式採取拯救的步驟。」

第二號文件，以「宣言」為題，其中指出：「現社會中存在着不安情緒，會導致民族團結的破裂，從而意味着國家建設的失敗」，並表示「誓以「走向安全之路」為綱，為全體印尼人民實現平等與繁榮社會」。題為「以退為進，求真善美」的文件，被列為第三號，據政府聲明指出：這份文件的內容：「對蘇哈托總統領導的評價，認為已完全失敗，因此要求或敦促蘇哈托把總統的權力

註⑨ 同註③

註⑩ 香港「星島日報」，一九七六、九、六、一版。

移交給哈達 (Mohammad Hatta)」。第四號文件名為「禪讓書」，這是一份「關於蘇哈托總統把總統職權移交給哈達博士的計劃」。第五號文件稱為：「寬恕已故總統蘇加諾兄的聲明書」，政府並未透露內容。

值得重視的是，這些文件有那些人簽署？其地位背景如何？據印尼政府在聲明中指出：這些文件都是由沙維托出面，總共徵求到了七個人簽名。註明日期為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七日的第一號文件，簽名者的次序為沙維托，印尼獨立宣佈者哈達博士，印尼天主教主教龍帝努斯、印尼基督教會主席西馬杜邦、印尼回教學者協會主席哈姆卡、印尼宗教合作祕書處主任蘇甘多。第二號文件為九月七日，簽署的有三人，為哈達博士、辛基碩士和沙維托。第三號和第四號文件都沒有註明日期，均由沙維托一人簽署。第五號文件的日期是一九七六年九月，有沙維托和哈達兩人簽署^①。

沙維托是農業部的高級官員，從一九六八年開始，因「受懷疑」為「蘇加諾主義者」而被冷落。哈達博士在印尼獨立運動中，其聲望僅次于蘇加諾，獨立後出任過兩任副總統共計十二年，因反對蘇加諾左傾而辭職。西馬杜邦，是五十年代印尼三軍參謀長，思想上與印尼社會黨接近。蘇甘多，是印尼獨立後的首任警察總長。辛基碩士，一九四五年曾參加與督促蘇加諾和哈達宣佈印尼獨立，被稱為「狂熱的愛國者」。綜觀這些文件簽署人，有獨立運動的元老，有文武官員中的老成者，有極左的「蘇加諾主義」者，也有人站在極右的立場，且包括了回教、天主教與基督教，可想見他們陰謀政變的動機，並非企圖使蘇加諾主義復活，也並非反對軍人政權，乃是另有原因。

五 經建由起飛而衰退所引起的問題

在蘇哈托總統執政十年來的經建，雖然稱得上突飛猛晉，到處一片繁榮，但最近一兩年，在雅加達卻顯出了衰退現象，物價的漲率也相當驚人、通貨膨脹，在上屆大選前，雖已降到了百分之八，但最近又已增高。據印尼進出口銀行總裁慕利約多向國會報告：一九七五年的印尼通貨膨脹率，為「東協」五國之冠，高達百分之廿。泰國為百分之三點一，大馬為百分之三點八，新加坡為百分之二點二，菲律賓百分之六點七。所以他認為通貨膨脹，嚴重地威脅了印尼^②。由此造成的物價奔騰，固然會導致人民對政府的不滿，何況隨經建突飛猛晉而來的諸般問題，也使他們認為違背了建國五原則的精神。

大量吸引外國資金技術以開發印尼資源，這是蘇哈托政府經建的主旨，但以外國大量資金和技術人員的湧入，及華人與外資合作的興起，于是造成了反對外國控制印尼經濟命脈的呼聲，甚至迫使政府不得不限定華人所經營的工商企業，都須讓出百分之五十股份給予印人。但印人所投資的事業的日益發展，又引起了壟斷財富的問題，并被認為財富日益集中，將迫使貧窮者更加貧窮

註① 「印尼最近發生了什麼事件？」雅加達航訊、白雁撰、香港「大公報」、一九七六、十、九、二版。

註② 「印尼國營石油公司的風波」、雅加達航訊、白雁撰、香港「大公報」。一九七六、十二、十三、二版。

。至于工業生產趨向現代化，促使原有的家庭手工業，以至設備落伍的工業都無法競爭，更被視為民族工業已遭到壓迫摧殘。他如貪污舞弊與官僚資本，亦早已成爲青年學生攻擊的口實。尤其是若干軍事將領生活享受的奢侈浮華，連身爲四星上將的納蘇申，也大表不滿。^⑬

蘇哈托總統執政十年來的經建飛躍進展步伐，到近年來所出現的遲滯，如果單是受到世界經濟不景氣的影響，應該值得國人諒解。但印尼爲石油輸出國家，在油價飛漲聲中，不僅未能與阿拉伯產油國家同樣獲得厚利，造成國庫的外匯存儲激增，反而由于國營石油公司「帕達米納」的經營不善，在宣告破產後所遺留的負債纍纍，迫使國庫不得不在有限的儲備金內，先償還該公司所借的高利貸款十九億美元，其餘的債款，據估計共有百餘億美元之鉅，以致印尼人民對此都十分痛心^⑭。沙維托等陰謀迫使蘇哈托總統下台的流產政變，其宣言中所稱的「不安情緒……會導致民族團結破裂……意味着國家建設失敗」，便是針對此諸般情形而言。

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當雅加達政府宣佈破獲沙維托事件後的一個多月，美國「新聞週刊」所刊載的一篇題爲：「印尼：希望在消逝中」的文章，又在印尼引起了另一場風波，負有印尼決策任務的「政治與治安穩定會議」，于十一月十六日在蘇哈托總統親自主持下，討論了這篇文章的有關問題，可見印尼當局對此文的嚴重關切。據新聞部長馬蘇里在會後透露：會議認爲此文對印尼非常不利，且侮辱了蘇哈托總統及其夫人。「恢復治安與秩序行動司令部」參謀長蘇杜莫海軍上將亦於會後稱：此文顯然具有「國內顛覆活動因素」。他早一天在另一公開場合指出：這篇文章「旨在使印尼人民和世界各國對蘇哈托總統的信任減弱或完全消失，且「孤立印尼，並使外國停止對印尼的援助和投資」，以致他擔心國際援印財團會受其影響。^⑮

六 新聞週刊所揭發的三大問題

上年十一月八日出版的「新聞週刊」，由駐在香港的史密斯所撰寫的一篇有關印尼報導，其主要內容爲三大問題：第一，貪污受賄；第二，印尼國營石油公司「帕達米納」的崩潰拖垮了印尼經濟；第三，蘇哈托的家屬利用特權大發橫財。文中指出：貪污是危害蘇哈托政府的癌症。而事實上，雅加達的報刊早已報導過此種貪污現象，已到了難以收拾的程度。十一月廿五日，蘇哈托總統下令將東加里曼丹米糧統購統售機構官員十三名撤職查辦，因爲他們兩年來集體侵吞公款達三千萬美元。他在「國慶文告」裏，亦慨嘆官員中有人竟把職權「商業化」——包括濫用職權牟取私利，收受賄賂佣金。

史密斯在這篇文章中，指出印尼國營石油公司「帕達米納」因欠債數十億美元而破產，使印尼經濟處于風雨飄搖之中，而來日還可能遭到更多的衝激。然而雅加達報刊報導的「帕達米納」問題更加嚴重，並引述印尼礦業部長在國會答覆質詢時說：到一九七

註⑬ 新加坡「南洋商報」、一九七三、五、十九

註⑭ 同註⑬

註⑮ 同註⑬

五年初爲止，「帕達米納」積欠的債務已高達一百零五億美元，此外，外國石油公司通過「帕達米納」上繳印尼政府的稅款和利潤，總共十一億美元也被它私下挪用，並未繳給國庫，再加上包租遠洋油輪毀約的賠款，無怪乎印尼最高評議院主席韋洛波說：「帕達米納」以它像雪球越滾越大的債務，已變爲「吞噬我們的怪物」。

關於貪污受賄的事件，印尼報刊已不斷加以揭露，連蘇哈托總統對貪瀆官員的斥責懲辦，亦並不諱言。至于「帕達米納」破產所遺留下的善後問題，及其對經濟的影響，更早已有新聞報導與評論見諸印尼報刊，亦即在史密斯這篇文章發表以前，便早爲印尼人民耳熟能詳。但由于此文刊載在銷行全球的美國「新聞週刊」，難免打擊印尼的國際聲譽，及影響外資的投注。尤其發表的時間，緊接着在沙維托政變陰謀被揭露之後，對不滿蘇哈托政府的暗潮，將勢必發生推波助瀾作用。

印尼「恢復國家安全與秩序指揮部」參謀長蘇杜莫將軍認爲新聞週刊的專題報導，是「一項顛覆印尼的企圖」，其目的在「瓦解印尼人民對他們領袖的信賴……這也許會造成社會不安，並使國家發展努力，實際上陷于停頓狀態」；并深信若無某些印尼人士的協助，作者史密斯無法蒐集到如此多有關於印尼的不利資料，對這些印尼「賣國賊」，「應該處以絞刑」。他復指出由于印尼具有戰略價值的地理位置和豐富的自然資源，顛覆仍然是一項潛在的威脅；繼稱：顛覆活動，正由國際共黨組織、分離主義運動殘餘份子、國際赦免組織，以及「由國內共黨份子、非法的政黨成員和極端團體組成的反政府陣線」進行之中。¹⁶

依照此種觀念，再證之以沙維托事件的政變計劃（預定在齋齋前製造騷亂），試想雅加達政府如果沒有破獲政變陰謀，或已被獲而竟把簽署文件人一併逮捕，必將造成人心的震撼；而在此情況下，又有這篇「新聞週刊」的文章適時發佈，這對印尼的暴亂可謂火上加油，其後果實將不堪設想。所幸蘇哈托總統對牽涉在沙維托事件的元老名人，經由他們上書說明並未看清文件內容即貿然簽名，表示了受騙的遺憾後，即不加追究，且聲明軍方並無人介入。¹⁷對新聞週刊的文章，除查禁與經由報刊辯駁澄清外，也並未株連供給資料的人。

七 對大選的展望

蘇哈托政府先前計劃將大選延期，顯然是鑒于剛剛起飛的經濟建設，又因遭遇到世界經濟不景氣的影響而形成停滯的現象，再加上國營石油公司「帕達米納」因管理不善，在宣告破產後所遺留下的債務纍纍，把國家經濟拖累到倒退四、五年，通貨膨脹又回升到了高居「東協」五會員國之首，在人言嘖嘖，反對派正藉機興風作浪，不惜爲共黨所利用的情況下，對大選頗不適宜，但當發現了政變陰謀時，又認爲唯有尊重建國五原則的「民主主義」精神，迅即籌備大選，方可安定人心與政局。

一九七七年五月大選的期間確定後，普選機構亦已開始工作，各地方政黨也正在從事候選人提名，大家所關心的，是此次大選

註16 「美國新聞週刊在印尼被查禁原委」，中央社雅加達航訊、謝善才撰。一九七六、十一、卅。
註17 新加坡「南洋商報」，一九七六、十、七、二版。

，執政黨——「從業人員集團」能否贏得勝利？以及在大選過程中，是否仍能平靜無波？對這些問題，我們可以從幾方面尋求答案。

自上屆大選以來，「從業集團」由於政府的加意扶持，其組織已擴大加強，而在競選戰場的對手在野黨，又已由九個政黨，歸併為兩個政黨：（一）「民主黨」；（二）「建設團結黨」，亦即連同「從業集團」，僅有三個政黨進入本屆大選的統選戰場，在上屆大選時，便已表示期望促成各政黨由九黨合併為三大政黨。其所以竟能符合此一預期目標，顯然是由於大批加入各政黨的退役軍人，已經發生了所負的主導作用，亦無異說明在野黨與軍方也是聲應氣求。

因此，印尼情報統籌機構副主任慕爾托波將軍於十一月二日，在答覆大選展望問題時稱：一九七七年的大選成果，將是多數票仍然操在「從業集團」手中，但在原則上：「民主黨」與「建設團結黨」都應該獲得席位。倘使「從業集團」得票過多，以致扼殺了其他兩黨或一黨，那將是很不幸的。所以為了維護憲法，本屆大選所產生的「國會」與「人協」，必須包括兩黨及「從業集團」的成員，否則祇是一個政治力量，則將演變為極權主義。¹⁸可見此次大選，已經沒有執政黨能否獲得勝利的問題，而是如何不致造成在野黨都全軍覆沒的情況。

再從「人民代表議會」（立法院或國會）議員四六〇人，及「人民協商會議」代表九二〇名的產生情形來看，對執政黨亦屬有利。因按照「普選法」規定，國會議員中，有軍人指定代表一〇〇名，其餘三六〇名由選舉產生，「人協」代表除全體國會議員均為當然代表而外，其餘一半，由各職業階層及地區分別平均產生——亦即由地區及武裝部隊與非武裝部隊所組成之職業階層各選出二二〇名，惟在選舉前，須各加倍提名候選人呈請總統圈定。由於蘇哈托總統兼任三軍統帥，加以各職業階層聯合會均已成為軍方外圍，所以此次大選中由職業階層選出的代表二二〇名，實即為政府代表，連同委派的武裝部隊參加國會的表一〇〇名，共計有「人協」代表三三〇名，佔「人協」代表總數三分之一強。實際上在競選中，祇須另外獲得一百卅多席，便可超過半數，無怪乎印尼官方認為大選已勝利在握。¹⁹

至於對共黨在大選中的興風作浪如何防範？會不會觸發學潮？據印尼第二軍區司令官威威多將軍於十一月廿三日在雅加達學生大會中指出：蘇俄情報機關KGB企圖在沙維托反政府陰謀事件中製造社會動亂，寄望乘文件簽署人遭受逮捕時，掀起羣衆示威，北平則以鼓勵貪污、走私及各種不法行為造成民怨，以便共黨煽動風潮，使整個印尼赤化。²⁰所以雅加達當局對於文件簽署人之不予深究以及蘇哈托總統之下令懲治米糧局貪污人員等措施，都具有粉碎共黨顛覆陰謀的作用。再加上普選法中特別規定：印共及其從屬羣衆組織成員，與「九卅」事變有關份子，都被剝奪了選舉與被選舉權，且在受到嚴密監視，故預料印尼的下屆大選，應可順利舉行。

註¹⁸ 「中印文經協會」雅加達通訊。一九七六、十一、八。

註¹⁹ 「印尼大選後之外交動向」，本刊，十一卷、二期、一九七一、十一、十、黎世芬著。

註²⁰ 新加坡「南洋商報」，一九七六、十一、廿四、一版。